

张富清家的餐桌上常常只有青菜、萝卜、油茶汤，比大多数社员的伙食都差。

可是，这个拥有“人民功臣”称号的转业军人却毫不在意。

他心里只装着一个念头：“党教育培养我这么多年，我能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党群关系密切了，再苦也知足了。”

张富清完全有条件为自己的家庭谋取便利，可是他没有。始终恪守“党和人民的要求”，标注他共产党人的精神境界

循着喧闹的城中街道，来到一座5层小楼，顺着台阶上2楼，就是张富清老两口的家。

走进客厅，一张磨损破皮的沙发、一个缺了角的茶几和几个不成套的柜子拼凑在一起。进了厨房，几只小碗盛着咸菜、米粥和馒头，十分素淡。

这套潮湿老旧的房子是上世纪80年代，张富清在建设银行工作时单位分配的。有人说这里条件不好，他只是淡淡一笑：“吃的住的已经很好了，没得什么要求了。”

比起过去，老两口总是特别知足。

在卯洞公社时，他们住在一座年久失修的庙里，一大一小两间，20多平方米，三张床挤了两个大人、4个小孩。一家人除了几个木头做的盒子和几床棉被外，什么家当也没有。

“他家的窗户很小、又高，屋里不通风，光线暗淡。他那时候分管机关，完全有条件给自己安排好一点。”董香彩回忆：“张富清的大女儿患有脑膜炎，因当年未能及时救治留下后遗症，这么多年来看病花钱，他从来不找组织特殊照顾。”

“不能给组织添麻烦。”这是张富清给全家立下的规矩。

上世纪60年代，国家正是困难时期，全面精简人员。担任三胡区副区长的张富清动员妻子从供销社“下岗”。

孙玉兰不服气：“我又没差款，又没违规，凭什么要我下来？”

“你不下来我怎么搞工作？”一向温和的张富清脸一板：“这是国家政策，首先要从我自己脑壳开刀，你先下来，我可以动员别个。”

孙玉兰下岗后，只能去缝纫社帮工，一件小衣服赚个几分钱。手艺熟练了，就开始做便衣，一件衣服几角钱，上面要盘好几个布扣。

回家做完功课，孩子们都要帮妈妈盘布扣。到了后来，两个儿子穿针引线的功夫都毫不含糊。有人替孙玉兰不平：他让你下来，你就下来，不和他吵？

“这个事情不是吵架的事情，他给你讲，这是政策问题，他把道理说明白，就不吵。”

那些年，张富清每月的工资，很难维持一家人的生计。除了患病的大女儿，其他三个孩子下了学就去拣煤块、拾柴火、背石头、打辣椒。

“衣服总是补了又补，脚上的解放鞋被脚趾顶破，就用草裹住捆在脚面上。”小儿子张健全记忆犹新。

相濡以沫，她理解他。可是，孩子有过“想不通”。

大儿子张建国高中毕业，听说恩施城里有招工指标，很想去。张富清管着这项工作，不但对儿子封锁信息，还要求他响应国家号召，下放到卯洞公社的万亩林场。

荒山野岭，连间房子都没有，两年的时光，张建国咬牙挺着，不和父亲叫苦。

小儿子张健全记得，小时候，父亲长年下乡，母亲身体不好、常常晕倒，几个孩子不知所措，只能守在床边哭……

张富清四个子女，患病的大女儿至今未婚，与老两口相依为命；小女儿是卫生院普通职工；两个儿子从基层教师干起，一步步成长为县里的干部。

子女们没有一个在父亲曾经的单位上班，也没有一个依靠父亲的关系找过工作。孙子辈现在大多在做临时工，一个孙媳妇刚刚入职距县城几十公里的农村学校。

“父亲有言在先，他只供我们读书，其他都只能靠自己的本事，他没有力量给我们找工作，更不会给我们想办法。”张健全说。

有人劝张富清“灵活点儿”，他正色道：“我是国家干部，我要把我的位置站正。如果我给我的家属行方便，这不就是以权谋私吗？这是对党不廉洁，对人民不廉洁，我坚决不能做！”

一辈子，“党和人民的要求”就是他的准则，“符合的就做，不符合的就坚决不做”。

分管财贸，他没有给孩子多搞一点营养伙食；分管街道，他没有把一个矛盾问题随意上交……

有一次，分管粮油的张富清把“上面”得罪了。某机关的同志来买米，提出要精米不要粗米。想到群众吃的都是粗米，又见对方盛气凌人，张富清看不惯，没几句就和对方红了脸。

来人跑去告状，一个副县长来了，批评张富清“太固执”。张富清很较真儿，回答说：“干部和群众应该一视同仁，如果我给谁搞了特殊，就违反了党的政策。”

战场上雷厉风行，工作中铁面无私。张富清把一腔热情投入建设来凤的工作中，却把一个永远的遗憾藏在自己心底。（下转4版）

英雄的选择

——95岁老党员张富清的初心本色

新华社记者

已换回二哥，被关在乡联保处近两年，饱受欺凌。后被编入国民党部队，身体瘦弱的他被指派做饭、喂马、洗衣、打扫等杂役，稍有不慎就会遭到皮带抽打。

这样的生活苦不堪言，直到有一天，西北野战军把国民党部队“包了饺子”，张富清随着四散的人群遇到了人民解放军。

“我早已受够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我在老家时就听地下工作者讲，共产党领导的是穷苦老百姓的军队。”张富清没有选择回家，而是主动要求加入了人民解放军。

信仰的种子，从此埋进了他的心中。

在团结友爱的集体中，一个曾经任人欺凌的青年第一次强烈感受到平等的对待和温暖的情谊。

历经一次次血与火的考验，张富清彻底脱胎换骨，为谁打仗、为什么打仗的信念在他的心中愈发清晰。

“从立功记录看，老英雄九死一生，为什么不想让人知道？”负责来凤县退役军人信息采集的聂海波对张富清的战功钦佩不已，更对老人多年来的“低调”十分不解。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多少）都不在了，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啊，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啊……”面对追问，这位饱经世事的老人哽咽了。

每一次，他提起战友就情难自已，任老伴儿帮他抹去涌出的泪水：“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了……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

亲如父兄，却阴阳永隔。在张富清心中，这种伤痛绵延了太久。那是战友对战友的思念，更是英雄对英雄的缅怀。

他把这份情寄托在那些军功章上。每到清明时节，张富清都要把箱子里面的布包取出，一个人打开、捧着，端详半天。家里人都不知道，他珍藏的宝贝是个啥。

“我没有向任何人说过，党给我那么多荣誉，这辈子已经很满足了。”如今，面对媒体的请求，老人才舍得把那些军功章拿出来。

多年来，他只是小心翼翼地，把1954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颁发的一个搪瓷缸，摆在触手可及的地方。这只补了又补、不能再用的缸子上，一面是天安门、和平鸽，一面写着：赠给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祖国、保卫和平。

总会有人问：你为什么不怕死？

“有了坚定的信念，就不怕死……我情愿牺牲，为全国的劳苦人民、为建立新中国牺牲，光荣，死也值得。”

任凭岁月磨蚀，朴实纯粹的初心，滚烫依旧。

她哪里想到，离家千里去寻他，一走就是大半生。在来凤这片毫无亲缘的穷乡僻壤，印刻下一个好干部为民奉献的情怀

1954年冬，陕西汉中洋县马畅镇双庙村，19岁的妇女干部孙玉兰接到部队来信：张富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昌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等她前去完婚。

同村的孙玉兰此前只在张富清回乡探亲时见过他一次。满腔热血的女共青团员，对这位大她11岁的解放军战士一见钟情。

少小离家，张富清多年在外征战。

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张富清随王震率领的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先头部队深入新疆腹地，一边继续剿灭土匪特务，一边修筑营房、屯垦开荒。

1953年初，全军抽调优秀指战员抗美援朝，张富清又一次主动请缨，从新疆向北京开拔。

待到整装待发，朝鲜战场传来准备签订停战协议的消息。张富清又被部队送进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

相隔两地，他求知若渴，她盼他归来。张富清同孙玉兰简单的书信往来，让两颗同样追求进步的心靠得更近。

“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部队来信后，孙玉兰向身为农会主席的父亲袒露心声。

临近农历新年，孙玉兰掏出攒了多年的压岁钱，扯了新布做了袄，背上几个馍就上路了。

搭上货车，翻过秦岭，再坐火车。从未出过远门的她晕得呕了一路，呕出了血，见到心上人的时候，腿肿了，手肿了，脸也肿了。

彼时，一个崭新的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大量建设人才。组织上对连职军官张富清说：湖北省恩施地区条件艰苦，急需干部支援。

拿出地图一看，那是湖北西部边陲，张富清有过一时犹豫。他心里惦记着部队，又想离家近些，可是，面对组织的召唤，他好像又回到军令

24岁，在生与死之间，他选择冲锋在前，在战火洗礼中成长为董存瑞式的战斗英雄。

31岁，在小家与国家之间，他选择服从大局，到偏远异乡投身社会主义建设。

半个多世纪，无论顺境逆境，他选择淡然处之，将英雄过往尘封在沧桑的记忆。

95岁高龄，在新中国即将迎来70华诞之时，他又一次挺直脊梁，向祖国和人民致以崇高军礼。

他，就是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凤县有着71年党龄的老兵张富清。

在他心中，没有什么比为国牺牲更光荣；没有谁比逝去的战友更值得尊敬。党旗下的誓言，就是此生不渝的初心

95岁的离休干部张富清，又一次当上了“突击队员”。这一次，是前所未有的任务——接受众多媒体记者的采访。

不久前，在国家开展的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工作中，张富清深藏多年的赫赫战功引发关注。

2018年12月3日，张富清的儿子张健全来到来凤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询问退役军人信息采集的具体要求。

回到家中，张健全问：“爸，国家成立退役军人事务部，需要如实上报个人信息，你什么时间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讲清楚。”

沉吟片刻，张富清说：“你去里屋，把我的那个皮箱拿来。”

这只古铜色的皮箱，张富清带在身边已有60多年。锁头早就坏了，一直用尼龙绳绑着。依着父亲的要求，张健全小心翼翼地开箱，把存在里面的一个布包送到了县人社局。

打开一看，在场的人都震惊了：

一本立功证书，记录着张富清在解放战争时立下的战功：军一等功一次，师一等功、二等功各一次，团一等功一次，两次获“战斗英雄”称号。

一份由彭德怀、甘泗淇、张德生联名签署的报功书，讲述张富清“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

一枚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的奖章，镌刻着“人民功臣”四个大字……

“哪里知道他立过大功哦。”老伴儿孙玉兰只见到他满身的伤疤：“右身腋下，被燃烧弹灼烧，黑乎乎一大片；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缝，一口牙齿被枪弹震松……”

张富清一年四季几乎都戴着帽子，不是因为怕冷，而是因为头部创伤留下后遗症，变天就痛。

左手拇指关节下，一块骨头不同寻常地外凸。原因是负伤后包扎潦草、骨头变形，回不去了。

多次出生入死，张富清在最惨烈的永丰战役中幸运地活了下来。

“永丰战役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取敌人碉堡两个，缴机枪两挺，打退敌人数次反扑，坚持到天明。我军进城消灭了敌人。”

这是张富清的立功证书上对永丰战役的记载。1948年11月，发生在陕西蒲城的这场拼杀，是配合淮海战役的一次重要战役。

“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受到影响。”入夜时分，上级指挥员的动员，让张富清下定了决心。

张富清所在的连是突击连。他主动请缨，带领另外两名战士组成突击小组，背上炸药包和手榴弹，凌晨摸向敌军碉堡。

一路匍匐，张富清率先攀上城墙，又第一个向着碉堡附近的空地跳下。四米多高的城墙，三四十公斤的负重，张富清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跳下去成功就成功了，不成功就牺牲了，牺牲也是光荣的，是为党为人民牺牲的。

落地还没站稳，敌人围上来了，他端起冲锋枪一阵扫射，一下子打倒七八个。突然，他感觉自己的头被猛砸了一下，手一摸，满脸是血。

顾不上细想，他冲向碉堡，用刺刀在下面刨了个坑，把八颗手榴弹和一个炸药包码在一起，一个侧滚的同时，拉掉了手榴弹的拉环……

那一夜，张富清接连炸掉两座碉堡，他的一块头皮被子弹掀起。另外两名突击队员下落不明，突击连“一夜换了八个连长”……

真实的回忆太过惨烈，老人从不看关于战争的影视剧。偶尔提及，他只零碎说起：“多数时候没得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有时间”“泪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虱子大把地往下掉”……

很多人问：为什么要当突击队员？

张富清淡淡一笑：“我入党时宣过誓，为党为人民我可以牺牲一切。”

轻描淡写的一句，却有惊心动魄的力量。

入伍后仅4个月，张富清因接连执行突击任务作战勇猛，获得全连各党小组一致推荐，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一个小小的长工，是党和国家培养了我啊！”时隔多年，张富清的感念发自肺腑，眼角泪湿。

出生在陕西汉中一个贫农家庭，张富清很小就饱尝艰辛。父亲和大哥过早去世，母亲拉扯着兄弟姊妹4个孩子，家中仅有张富清的二哥是壮劳力。为了减轻家中负担，张富清十五六岁就当了长工。

谁料，国民党将二哥抓了壮丁，张富清用自